



學苑出版社

詩經要籍提要

主編 夏傳才
董治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經要籍提要/中國詩經學會、《詩經要籍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夏傳才、董治安主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8

ISBN 7-80060-006-8

I. 詩… II. ①中…②夏…③董… III. 詩經-古籍-內容
提要 IV. Z89:I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9584 號

學苑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萬壽路西街 11 號 100036

總編室電話:010-68281490

發行部電話: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E-mail: guoq2008@sohu.com

永清印刷廠印刷

890×1240 32 開本 16.25 印張 332 千字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2000 冊 定價:36.00 元

编辑说明

一、《詩經要籍集成》是中國詩經學會組織專家、學者歷經十年編纂而成的一部大型《詩經》文獻集成，收錄現存的《詩經》文獻要籍一四一種，附錄《詩經》學著作存目及存目提要二六〇種、清代及民國著作輯目二二九種。《詩經》學存世著述盡備大觀於此。

二、《要籍》收錄的《詩經》學著述，編排順序以時代為序，兼顧《詩經》學各家、各流派的代表作，上迄漢唐、下至清末民國。每種書名以其正文卷端題名為准，一些習慣上的稱謂擯棄不用，或加（ ）以示之，如《齊詩后氏傳》，題名為《齊詩傳》，本叢刊著錄為《齊詩（后氏）傳》。

三、編委會組織專家、學者對《要籍》收錄的一四一種詩經學著述撰寫了一三三則提要，概述作者簡介、所屬流派、內容及文獻價值、版本流傳遞嬗等情況，每種提要附於每種小書名頁之後；同一流派、關聯緊密的幾種著述提要合併為一，附在最前一種書名頁之後，如：《轅固齊詩傳》與《齊詩（后氏）傳》提要合併為一，名為“轅固齊詩傳提要附齊詩（后氏）傳提要”。

四、編委會為便於研究者使用，為《要籍》編撰了總目錄，附於書前；每冊前附分冊目錄。

五、編委會組織專家、學者亦為《存目》撰寫了提要二六〇則，其中漢至唐十三則，宋代二十則，元代九則，明代九十六則，

清代一二〇則，民國八則，概述其作者簡況、所屬流派、文獻價值、傳世版本等，並為《存目》提要編制了目錄，冠於其前。

六、《清代及民國著作輯目》共收清代著述二一二種、民國著述一二種，另收朝鮮漢文著述五種，附列於最後，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經有提要，故僅列題名，下著錄著者、版本。

七、本書的出版，得力于學苑出版社的大力協助，在此特致感謝。

《詩經要籍集成》編輯委員會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前言

我們為什麼要編輯這一部《詩經要籍集成》呢？兩千多年來，《詩經》學著述浩如煙海，據歷代各種文獻書目著錄兩千餘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經調查，現尚存六百餘種，分散各處，有的流落海外，收藏在英國、法國、日本等地。分藏在海峽兩岸的，也分散在不同的圖書館。可以這樣說：沒有任何一個大圖書館能夠全部收藏，也沒有一位學者能夠全部讀到。而且，有些書已定為善本珍藏，一般讀者極難一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輩學者曾計劃精選代表性著述編印叢書，由於三十年代的戰爭環境和五十年代的客觀條件，兩次計劃都未能實現。

1993年中國詩經學會成立時，提出了編輯出版《詩經要籍集成》的計劃，立即得到海峽兩岸與會專家學者的熱情支援，由張松如、曹道衡、聶石樵、褚斌傑、顧易生、趙逵夫、林慶彰、向熹、趙沛霖以及董治安、夏傳才組成編委會，由夏傳才、董治安任主編。臺灣同行積極支援，林慶彰、趙制陽、左松超、蔣秋華撰寫部分提要並提供部分資料。當時議定，仿四庫體例，為所選要籍撰寫提要，未編選者存目亦附簡明提要。歷時十年，至今完工。

綜上所述，我們編輯這套叢書，是為海內外《詩經》研究者提供一套有價值的資料，是弘揚中華文化的基本建設工程之一；由海內外同行分工合作，是開展兩岸和國際文化交流的具體舉措。

下面,有必要據《詩經》研究的當代成果,說明以下三個問題。

一、《詩經》的重要價值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文化的元典之一。

《詩經》原稱《詩》或《詩三百》,它產生的時代,我們可以大致論定其中最早的作品創作於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創作於東周的春秋中葉,全部作品產生於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五世紀之間的五百多年之中。當然,其中某些作品,可能利用了遠古的傳說和素材(如周人開國史詩),或有上代的藍本(如《商頌》),但最後寫定,仍在這五百多年之中,可統稱為周詩。

根據史料,這些詩篇在春秋時代已經在貴族社會廣為流傳,普遍應用在宗廟祭祀、朝會的各種典禮和貴族社交活動的各種禮儀之中;而且列國人士更進一步地把這些詩的言辭應用於社會生活和政治交往,作為一種特殊的通情達意的工具,用比喻或暗示的方法傳達彼此的立場和意見,《左傳》和《國語》有大量賦詩言志的記載。因此,在貴族學校裏,它成為必須學習的重要科目。《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吳公子季札聘魯,魯國為他演奏周樂,演奏的內容和順序,大體和現在流傳的《詩經》相同,當時孔子八歲,可以證明在春秋後期,已經有了一個內容和編次與今本《詩經》差不多的結集,而且已經是貴族學校的課程。

春秋戰國之交是中國社會的一次重大變革時期,生活於春秋末期的孔子,懷抱他的社會政治理想,對古代文獻進行長期的收集和整理,對當時開始散佚的這些詩歌作品,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編訂,用作教授學生的教材。孔子死後,儒家學派繼續

使用。漢代獨尊儒學，孔子被尊奉為封建社會的聖人，他編訂的包括《詩經》在內的五種典籍被尊奉為五經，兩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傳統教科書。按照孔子的詩教原則，《詩經》這部古老的文學作品，成為人人必須誦習的社會倫理道德教材，而且，同時是語言和博物讀本。在明、清兩代幾百年時間之中，它又是中國以及日本、朝鮮等國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世界還從來沒有一部詩集產生過如此重大的影響。

《詩經》是中國詩歌由口頭創作轉化為書寫文學的第一部詩集，整個璀璨的中國詩史是從它開始的，它被稱為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中國詩歌之始祖。它的創作思想和成功的藝術經驗，哺育了中國一代代詩人，在人類詩歌藝術殿堂熠熠生光。它對東亞諸國的文學與文化，也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從十八世紀開始，《詩經》在全世界廣泛傳播，被公認為是不朽的世界文學名著，是與希臘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的人類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兩個多世紀以來，《詩經》研究一直是世界漢學的一個熱點。

《詩經》產生在上古時代，這些詩篇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因而，它保存了豐富的社會史料和文化史料，而且具有無可懷疑的真實性，對於研究史前史、西周史和春秋史，都是寶貴的資料，也有助於研究歷史地理學、宗教學、神話學、社會民俗學以及人類文化學範疇的衆多課題，即便詩篇中記載的各種名物，對於研究農業史、古代博物學、天文學也不可或缺。《詩經》的史料價值，越來越多地被史學界所重視。

《詩經》的語言是經過提煉加工的在先秦全民共同語的基

礎上規範化的語言。它一共使用了二九四九個單字，有許多單字一字多義，按字義計算大約有三千九百多個單音詞，這些單字又構造了近一千個複音詞。這將近五千個辭彙中，有豐富的動詞、形容詞、疊字詞、雙聲疊韻詞和大量虛詞，能夠較為多樣和精確地反映事物。《詩經》也綜合運用各種修辭格，常常在一篇詩中，具有不同修辭效果的辭格交錯使用，前後配合，互補互觀，珠聯璧合，渾然一體，把內容表現得豐富多彩，鮮明有力。《詩經》的語言正處於漢語由以單音詞為主向複音詞發展，而且既有大量地方方言，全民共同語也已經形成的階段，研究這種語言，對於研究漢語史，認識漢語發展規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詩經》全是合樂的歌詞。合樂，要有和諧的音節和聲韻。除《周頌》中有七篇詩無韻，二百九十八篇全有韻。現在覺得許多地方不合轍押韻，是因為長期以來語言演變，古音與今音不同。《詩經》韻律雖然靈活變化，但自然和諧，我們仍可探討出它的規律，推擬出古音來。古人沒有科學手段，不能把聲音保存下來，但是古音保存在《詩經》裏。研究古音韻，《詩經》是最好的資料。

《詩經》的文學價值、史料價值、語言學研究價值，都有待我們繼續發掘和利用。《詩經》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詩經學已是國際性的學術，我們的研究將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詩經》是中華文化的元典，海峽兩岸同根同源，都在研究，我們的研究將促進團結與合作。

二、《詩經》的幾個基本概念

（一）《詩經》的體制和基本內容

《詩經》共有三〇五篇詩，分《風》、《雅》、《頌》三類。《頌》詩四十篇，其中《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周頌》是西周王室的宗廟祭祀樂歌，主要產生於西周前期社會興盛時期。周王朝為鞏固和發展興旺安定的局面大興禮樂，製作一些祭祀樂歌，在“成康盛世”，這些樂歌已經積累不少，昭王時又繼續修訂和補充。據說，《周頌》中最早的詩，是武王伐紂勝利回朝祭祀文王時製作的《大武樂章》六篇，在今本《詩經》中尚保存着；最晚的詩是昭王初年祭祀武、成、康三王的《執競》。從這些詩所祭祀的物件和所反映的史實來看，可以大致推定《周頌》大部分製作在西周前期即公元前 1058 年以後的七八十年之間，關於這些頌詩的作者，傳統注疏曾說某些詩篇為武王、周公所作，這不一定可靠，大約主要出自王朝史官或太師（樂官）的手筆。

就《周頌》的主要內容而言，它們歌頌受命於天的先王的功業，美化開國者的完美品格，膜拜上帝的仁德和無上權威，祈求福佑國運長久、五穀豐登。如果只把這些頌歌看作一般的溢美諛辭，就未免失之於簡單化了，這些作品也有其深層的內涵。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它們歌頌了當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政治力量的代表，歌頌一個關懷人民疾苦的道德神並在其反暴政的旗幟下進行社會政治改革，歌頌開明繁榮的新國家的締造者並把他作為民族領袖和政治思想代表。這些歌頌反映了一個新時代的前進步伐，呈現了我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

《魯頌》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宗廟祭祀樂歌。朱熹《詩集傳》

說：“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現存《魯頌》四篇是魯僖公時製作，約在公元前 656 年以後的幾年，比《周頌》晚幾個世紀，其中《閟宮》一篇署名奚斯，是魯國大夫。

《商頌》是宋國的宗廟祭祀樂歌。宋國是殷商的後裔，現存《商頌》五篇的內容，有的是記述殷商先祖功業，可能是先世留傳或後世追述，也可能最後寫定於春秋時代，它產生的時間，學術界尚無定論。

《雅》分《大雅》、《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全部是西周的作品，它們主要是朝會樂歌，應用于諸侯朝聘、貴族享宴等朝會典禮，比較只應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內容較爲擴充，大半產生於西周前半期和宣王“中興”時期，有的出自史官、太師的手筆，有的有作者署名，可以證明是公卿列士的獻詩。《大雅》中的五篇周人開國史詩，利用了遠古流傳的材料；一部分政治諷諫詩，則產生在西周政治腐敗、社會危機的厲、幽兩代，是《詩經》中的重要篇章。

《小雅》七十四篇，基本上是西周後期的作品，應用範圍由朝會擴延到貴族社會的各種典禮和宴會，所以也有反映貴族社會生活和習俗的詩歌。西周後期一部分士大夫和貴族階級下層寫了一些諷諫怨刺之作，占《小雅》的大部分，少數篇章有署名，大多沒有署名。

《國風》一六〇篇，是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詩歌，各以其所在國家或地區得名，總起來看，在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

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大體包括當時中國的全部地域，主要在黃河流域，向南擴展至江漢流域。這廣闊的區域，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搖籃。這些詩的絕大部分是春秋初期至中期即東周的作品，少部分是西周後期的作品，《豳風》和二《南》中也有從西周前期流傳下來的少數作品。不能認為《國風》全是勞動人民的民歌，它們有一部分原來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歌謠，也有一部分貴族的作品，大部分是下層士吏及其家屬的作品，而那一部分原來勞動人民的歌謠，也經過整理記錄和編訂時的加工。《國風》的作者出自社會各階層，內容有勞者之歌、行役之怨、情詩戀歌、婦女婚姻、國家興衰、民俗風習、諷刺民謠、沒落階級的哀歌等等，因而廣泛地反映了周代的社會生活，被稱為“周代社會的百科全書”。

這些詩歌作品，是怎樣編成一個總集並且代代流傳下來的呢？據說周代有過公卿列士可以陳詩進諫的制度，如《左傳·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左傳·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大雅》的《民勞》、《板》以及《小雅·節南山》也都證明西周確有公卿列士向國王陳詩進諫的事實。二《雅》中大量針砭時政、言辭激切的諷喻詩、怨刺詩的產生和流傳，是爲了通過諷諫來達到改良政治的目的。另外據說周代還保存著由上古時代傳下來的采詩之制。先秦古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漢代追記有王官采詩、各國獻詩兩說，成書于戰國中期的《禮記》追記有太師陳風之說。如《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循于路以采

詩，獻于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說的是王官采詩。何休注《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這說的是各國獻詩。《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風以觀民風。”這說的是太師（樂官）陳風。可以認為十五《國風》通過王官采詩、各國獻詩、太師收集整理等各種渠道採集集中到主管部門配製樂曲或校正音律，予以應用和流傳。

《詩經》現在有三〇五篇，有的傳本卻有三一一篇篇目，但其中六篇有其目而亡其辭（稱為“笙詩”），所以實際上仍是三〇五篇。

（二）風雅頌和賦比興

《詩經》分《風》、《雅》、《頌》三大部分。它們是根據這三部分詩和樂的樂調編訂的。《頌》配製的是祭祀樂曲，“頌”字古訓“容”，也就是現在的“樣”字，是有舞蹈配合的樂歌。“頌”、“庸”古寫通假，“庸”即“鏞”字，是一種大鍾，其聲調緩慢、莊重，餘音嫋嫋，至今宗教儀式還有類似樂器和樂曲。《頌》全是由大鍾伴奏、聲調緩重、配合舞蹈的祭祀樂歌。“雅”古釋為“正”，又“雅”、“夏”二字通用，周王畿一帶原是夏人的舊地，稱為夏地，其言稱為“雅言”，其聲稱為“正聲”。宮廷和貴族用的樂歌要用雅言和正聲，就是正樂。據考證，古時原周王畿一帶就有一種名叫“雅”的樂器，它碩大而笨重，為正樂所用。“雅樂”

原來只有一種，後來吸收土樂的影響，樂器改進得較為小巧靈活，產生了新的雅樂，便叫舊的為“大雅”，小的為“小雅”。“風”名的本義，就是樂調，所謂“國風”，就是土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地方樂調。朱熹《詩集傳》說：“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很接近這種認識。由以上敘述可知，三百篇全是樂歌，它的編排體制，是以這三大類不同的樂調來分類的。這樣的編排方法，最初有他的實用性和科學性。後來時代久遠，社會變遷，古樂失傳，只保存下三〇五篇歌詞，人們對它的編排體制便不容易明白了。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篇之異詞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他把“六義”解釋為三種體例和三種基本的表現方法，這一“三體三用”說，為後來大多數《詩經》學者採用和發揮。宋朱熹的說法也比較簡單：賦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興者，托物興辭也。具體點說：賦是直接敘述事物，鋪陳情節，抒發情志；比是比喻和比擬，也就是利用兩種事物之間的某種相似點來打比方，或用淺顯常見的事物來說明抽象的道理和情感；興是先描繪某種事物的形象，用以引起所要詠唱的內容，借助聯想和啓發的作用，達到某種預期的目的。

古人對“六義”的理解，與上述解釋並不盡相同。考察“六義”的本義，據現有文獻，“六義”之說初見於戰國中期成書的《周禮·春官·太師》：“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來，《毛詩序》稱“六詩”為“六義”：“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它所說的“風”，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即用於“風化”、“風教”之義；說的“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廢興”，用於言朝政；所說的“頌”，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用於祭祀。它所說的這三者不是三類詩體，而是三種用詩之法，至於賦、比、興則略而未談。現代不少學者認為，就戰國和漢代對“六詩”、“六義”排列的順序及漢儒從各種角度的解釋，這六個並稱的概念，不可能是半為體裁，半為表現方法，在那個普遍傳詩、用詩的時代，風、雅、頌是用詩之法，賦、比、興的本義也是用詩之法。賦法，就是社會政治交往中曾經風行的“賦詩言志”的“賦”，從詩中斷章取義用於專對、議論或通情達意；比法，就如鄭玄《周禮注》所言“言古以劉今”，“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關於“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鄭衆曰“興者，托事于物”，鄭玄曰：“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上引均見鄭玄《周禮注》）興法，就是運用詩中的形象通過類推，啓發聯想來感發志意、涵情養性。六義的本義就是六種功用不同的用詩方法。我們認為，六義的原始意義，與孔穎達的“三體三法”說並無根本的矛盾，它們仍是相通的。《風》、《雅》、《頌》的樂曲形式、歌辭內容和具體運用是一致的；賦、比、興各法運用的思維特徵與這三者之作為詩歌基本創作方法的思維形式也是相通的。所以孔穎達的理論也反映了《詩經》詩體和詩法的實際，因而一千多年來為學術界普遍認同，並繼續研究和深入發揮。

（三）《詩經》的藝術經驗

《詩經》在藝術創作經驗上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詩經》的創作方法體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基本特徵是面向現實，從生活中概括形象，反映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思想情感。

《詩經》是詩與音樂的結合。三百篇全是樂歌，歌辭（詩）配合樂曲歌唱。它與民歌有密切聯繫，許多作品就是民歌。這是它長期而廣泛流傳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後來樂曲失傳，它本身的韻律、節奏仍然保存，朗朗上口，便於傳誦。中國古典詩、詞、曲都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

《詩經》成功運用了賦、比、興三種基本創作方法。善用比、興之法固然是《詩經》的重要風格特徵，而善用賦法也是其成功之處。它以賦法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意在言外、委婉含蓄；以賦法寫景，或刻畫景物，或情景交融；以賦法敘事，或鋪敘敷陳，或重點勾勒，大都寫得精彩紛呈。

《詩經》的句型以四言爲主體，在其總句數七二八四句中，四言句爲六七二四句，約占百分之九十二強，其他爲雜言。所以，《詩經》基本是四言詩，又兼采雜言，形式靈活多變；這尤以《國風》形式變化多，表現了活潑自由的民歌特色。《詩經》的詩體，既有工整和諧的格式，又不受其束縛，用以表現不同的內容，造成不同的語氣，達到工整與靈活相統一。《詩經》的章法，其章句長短不等。有的詩有十章，有的詩僅一章；有的一章多達二十二句，有的僅有二句。多、少、長、短，視表達的內容而定。《國風》以及接近《國風》的《小雅》，比較普遍地使用重章疊唱的方法，很多詩篇各章的結構、語言幾乎完全相同，中間只換幾個字。這樣採用章節複還的形式，反復詠唱，不但便於記憶，利

於傳唱，而且反復詠歎同一內容，一唱三歎，能夠充分抒發思想感情，加強感染力。重章疊唱也可以起到一章比一章詩意發展或感情加深的作用；還可以只重復前幾句，或只重復結尾幾句，形式多樣。複還章法，是《詩經》語言藝術的一大特色，對中國詩歌有深刻長遠的影響。

（四）《毛詩》和《毛詩序》

先秦春秋時期，《詩》在社會廣泛應用和普遍傳習，經過孔子整理編訂，並推行詩教，在戰國時期，一直是影響最大的儒家學派的基本經典，其他學派也相當重視。秦代實行文化專制，焚《詩》、《書》，《詩》與其他一些先秦典籍，瀕臨幾乎毀滅的浩劫。三百篇是合樂的歌詞，那時古樂曲尚未完全失傳，韻文又便於詠誦和記憶，《漢書·藝文志》說：《詩經》“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所以它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和流傳。

漢初開書禁，准許私人傳授古學，官方把五經立為官學。當時整理的寫本，為了講述便利，都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書寫，稱為今文經。今文《詩經》傳授者和搜集的地區與時間不同，由於過去口耳相傳記憶不准或口音不清，有多家傳本。1979年出土的阜陽《詩經》漢簡，證實了《漢書》的漢初傳《詩》多家之說。廣泛流傳的主要是《魯詩》、《齊詩》、《韓詩》三家，稱“今文三家”，簡稱“三家詩”。西漢中期又陸續發現了一部分用戰國時代篆書書寫的經籍，為古文經。古文《詩經》，只有《毛詩》一家。“三家詩”和《毛詩》不只是書寫文字的不同，文句、訓詁和內容解釋也有很大的差異。漢代傳經重視師法門戶，形成齊、魯、韓、毛四家並傳，根據優勝劣敗的原則，後來“三家詩”先後

衰亡，《毛詩》獨傳。我們現在流傳的《詩經》，就是《毛詩》。

《毛詩》由毛亨、毛萇所傳，稱大毛公、小毛公。傳說荀子《詩》學相承自孔子弟子子夏，毛亨承自荀子，他在西漢初年開門授徒，著《詩故訓傳》，後簡稱《毛詩》，傳于趙人毛萇。毛萇任河間獻王的博士，設學傳《詩》，至今河間詩經村遺迹猶存。《毛詩》在民間長期傳授，東漢時期立為官學，取代了“三家詩”的地位。

“三家詩”的傳本失傳，其遺說仍可搜集到相當一部分。司馬遷習《魯詩》，所以《史記》引述的是《魯詩》；劉向、劉歆世習《魯詩》，所著《說苑》、《新序》、《列女傳》以及班固執筆的《白虎通》，說《詩》都本《魯詩》；《爾雅》也是《魯詩》之學。董仲舒習《齊詩》，他的《春秋繁露》以及荀悅《漢紀》、焦氏《易林》、桓寬《鹽鐵論》所稱引的《詩》說，當是《齊詩》。《韓詩》現尚存經隋唐學者修改補充過的《韓詩外傳》。從宋至清，歷代學者持續地致力於搜輯“三家詩”遺說，清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是搜輯的集大成著作，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是這方面的研究著作。

東漢流傳的《毛傳》，在三〇五篇題目下面，各有一段類似題解式的簡略文字，簡述詩的題旨、背景與作者，稱作《詩序》。“三家詩”流傳中也有序（阜陽《詩經》漢簡也有序，更可證實），所以為了把現在流傳下來的《詩序》說得更準確一些，稱為《毛詩序》。《毛詩序》曾經是長期封建社會《詩經》義疏的中心，關於它的作者、大小序、尊廢等問題，兩千年來，一直是熱烈爭論的一大公案。

《毛詩序》為各詩所作的題解，為了推行詩教，把這部詩集·